

历史文化地理视角下的 德国国民特征研究*

王志强

摘 要:国民特征有着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地理背景。从文化认知视角来看,国民特征具有内在隐性特征和外显性特征两大特点,在这两者关系中,显性民族特征反映隐性民族文化价值和文化历史特殊性。基于这一对国民特征的认知,本文从历史文化地理视角阐述影响德国国民特征的诸因素,在此基础上确定当代德国国民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德国国民特征; 日耳曼精神; 普鲁士精神; 路德职业观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 教授 博士 上海 200086

中图分类号:G03.516;G07.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0)02-0059-06

在全球化时代,国民特征研究是跨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并越来越受到各国和各学科领域的关注,成为美国、欧洲的文化学、跨文化交际学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哲学领域内重要的研究课题。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征有着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受到文化认同的影响。“对一个民族性格上的特征进行说明,只有基于对该民族的全部历史进行研究之上,才能达到像样的准确程度”。^②从社会学角度看,国民性是用来表示文化精神和心理结构的集合概念,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起作用的文化精神、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故称民族性格^③。从文化认知视角来看,国民特征具有隐性和显性两个方面。隐性特征是指心理的、精神的等意识方面的特点。^④它虽不具有直观性,但它会外化为一种习惯和行为方式,如德国人的勇敢性和秩序性、纪律性和严谨性、忠诚性和法制性、个体性和务实性等特征。这些可观察到的显性特征存在于隐性特征中,而隐性特征又通过显性特征表现出来。

正是国民性的这种隐性到显性的外化,使国民特征研究有了切入点。

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显性民族特征反映隐性民族文化价值和文化历史特殊性。国民性一方面有其稳定性,表现为相对稳定的习惯、观念、心理以及行为模式,另一方面有其继承性。国民性的隐性内涵及其所承载的价值体系也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国家的重

* 本论文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重点学科建设规划项目资助。

① 参见 Alexander Demandt, *Über die Deutschen - Eine kleine Kulturgeschichte*, Berlin: Propyläen Verlag, 2007; 王志强:《文化价值取向与文化行为方式——中西文化价值和行为不同性探析》,载《德国研究》,2007年第1期,第43-49页。

② [德]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黄正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页。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④ 参见王志强:《欧洲对文化概念的界定及文化理论发展》,载《德国研究》,2005年第1期,第51-55页,这里第53页。

大事件或政治变化以及社会和文明发展会对国民的某些特征产生重大影响,如二战以后在德国形成的和平主义思想就是基于德国人反思战争、反思历史所产生的观念转变。德意志民族国民特征的外在显性特征和表现形式形成于漫长的德意志历史文化发展过程,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从德国历史演变视角看,对德国国民特征起主导影响作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日耳曼精神和普鲁士精神、重大历史性文化事件如德国宗教改革及其新教理念的传播、德国特殊地理环境和欧洲追求个性和自由的启蒙运动等。

一、日耳曼精神和普鲁士精神 对德意志民族特征的影响

日耳曼民族被看作德意志人的祖先,对于其民族特征,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在其《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中有着详实的记载^①。塔西陀笔下的日耳曼人注重忠诚、名誉、荣誉和勇敢,将忠于本民族、忠于首领和勇敢视为“美德”,把效忠部落首领看作天职,并以此为荣。为了名声和荣誉,日耳曼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人的生命和财产均可随时流逝,但事业的荣耀和功绩将流芳百世。日耳曼人凭借对本民族的忠诚和勇敢,不畏外来入侵。这一特有的民族忠诚意识决定了其对异族的态度。为了保持种族纯洁性,人们反对同异族通婚。历史上,对日耳曼人来说,名誉和荣誉建立在战功的基础上。在当时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下,勇敢性被看作人生存的重要前提。在战场上,日耳曼人十分勇敢,宁死不屈,在打仗时在家中却显得懒散,不愿意在农田干活。“日耳曼部落兼以狩猎、畜牧和不断的战争和迁移所允许的那些种植业为生。耕作大部分留给了妇女、儿童和老人——即所有不能拿起武器的人们。”^②人们强调部落成员间的平等和团结。

军事性构成了日耳曼民族的另一重要特性,人们强调顺从意识,服从部落首领。日耳曼部落首领要求其随从“坚定不移的忠诚,必要时甚至以死效忠,以获得保护、供给、武器方面的指导以及分享任何战利品。亲兵制度完全是建立在首领与随从之间的私人忠诚和信任的基础上。任一方面的背信行为,都会使这种关系废除。恰恰是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明确性,给这种私人关系以其道义的力量,并使其约束神圣化。个人忠诚不仅在部落时期,而且在整个中世纪时代,都是最高

的日耳曼美德。它维系封建体系,居于高于部落联系和亲缘纽带的地位。”^③日耳曼人在战场上强调战斗精神,服从上级首领的军事纪律,甚至愿意为之献身。军事性也贯穿于日耳曼人日常生活的诸层面,如在孩子进入成人阶段,人们会赠送予长矛和盾牌等兵器。除成人节外,日耳曼人的婚姻也充满着军事性特点,如女方陪嫁要有战马和长矛;妇女要忠于婚姻,她们可以不爱丈夫,但要维系婚姻。虽然日耳曼人对妇女有着严厉的守节要求,但妇女享有较高的地位,她们受人尊重,在打仗时可以就地观战,鼓励丈夫勇敢应战。在饮食方面,日耳曼人不懂精细烹饪,喜欢直接吃野果、野味和鲜奶,饮酒没有节制。在信仰上,人们笃信自然神和迷信,将星辰等自然现象奉为神,并以此命名星期的名称。“在日耳曼神话中,战争就是自然界的秩序,就是生命的基本要素。”^④

形成于17世纪的普鲁士王国在很多方面继承了日耳曼民族的特点和日耳曼精神,尤其是日耳曼民族的军事性、勇敢性、尚武性等特点。这些日耳曼民族特征随着普鲁士王国军事化的不断深入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德意志帝国内,普鲁士王国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改革,在当时成为先进的现代化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了普鲁士向外扩张的要求,军事改革贯彻了全民军事化理念,奠定了普鲁士精神和普鲁士国家的行为特征。^⑤普鲁士的精神包括军国主义思想、国家利益至上和顺民精神三个方面。军国主义是普鲁士王国的立国之本,国家利益至上是普鲁士王国对百姓的国家意识要求,军国主义和国家利益至上思想互相影响,互相支撑。在普鲁士,每个人无论贵贱贫富,都以其精神、身体和全部财富隶属于国家,服务国家,个人的生活要遵从国家的安排,国王自称为“国家的第一公仆”。由此奠定的军国主义和国家利益至上意识不允许有悖于国家利益的个人行为的存在。

普鲁士王国的军国主义也奠定了普鲁士精神和普鲁士人的行为标准。普鲁士推崇勤俭、忠诚、廉洁、精

① Tacitus, *Germania*, übersetzt v. Manfred Fuhrmann,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Verlag, 1977; [德]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

② [德]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第36页。

③ 同上,第39页。

④ 同上,第43页。

⑤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四章,第78-113页。

确和准时,要求绝对服从,遵纪守法,敬业爱岗,忠贞不渝,在这方面,荣誉、服从和勇敢成为普鲁士人的重要美德。对普鲁士将士来说,效忠国家、效忠国王,为国服务是最大的荣誉;荣誉来自纪律,纪律是国家荣誉和生存的基础。通过官僚机构军事化,那些本属于军人的职业道德和“美德”随之渗透于普鲁士国家机构,并由此进入普鲁士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普鲁士人的普遍行为准则;普鲁士王国要求国家官吏恪守服从、尽职、守时、节俭和准时,放弃个人意志、个人思想和个人利益,盲目服从国家利益,履行个人对国家承担的义务,荣誉胜过薪俸。在学校通过严格教育和军事化教育方式,从小培养学生的忍耐、勤勉、律己和为国家服务的普鲁士精神意识,借助这种教育奠定的普鲁士精神和普鲁士百姓行为准则,使普鲁士王国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强国,并最终统一了德国。

二、马丁·路德神学思想对德意志民族特征的影响

除日耳曼精神和普鲁士精神外,在德意志民族形成过程中,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及其神学思想也被看作影响德意志国民特征的关键要素之一^①。海因里希·海涅在他的著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强调了路德与德意志民族国民性的互动关系,他认为,路德“在我们历史上不仅是最伟大的,也是德国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故而德国人的所有优点和弱点在他的身上非常出色结合在一起。”^②

(一)宗教改革对德国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影响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独霸天下,统治着欧洲乃至西方的整个文化,神是宇宙的中心,人们进入“天国”的希望又成为基督教教会统治百姓的手段。在路德时代,基督教的教义认为,人由于“原罪”而被诅咒并被罚出了天堂。罗马天主教会宣传“救赎教义”,推出赦罪符。教徒若想赦罪,只有购买教会发放的赦罪符,才可以去除罪恶,进入天国。路德反对赦罪符买卖,他认为,人只有凭着信仰才被拯救,而不必购买赦罪符。1517年10月31日路德通过95条论纲公开反对当时罗马天主教会赦罪符实践,将《圣经》视作人与上帝之间信仰关系的桥梁和路径,由此开启了信仰由外向内的转向,对天主教垄断《圣经》解释权提出了巨大挑战。在此基础上奠定了路德神学的三个核心思想:其一是因信称义,通过内心真正信仰上帝,才能获救;其二,反对教皇永无过错的观点,否定教皇的权威性,

认为只有《圣经》是惟一正确和最高的权威;其三,信徒通过《圣经》直接面对上帝,并对上帝负责。这一神学思想危及教会的存在,由此引发了带来基督教世界第二次分裂的宗教改革。

就宗教自身而言,宗教改革导致宗教分裂,产生了新教,形成天主教和新教在德国乃至欧洲的对峙,并影响到当代德国宗教信仰的地理分布。“在两德统一以来,新教在德国依然占有略微多数。从传统角度说,德国北部和东部地区以新教为主,南部和西部地区以天主教为主”。^③对德意志民族而言,路德的宗教改革具有宗教性和民族性两大特点:宗教性是指对宗教的改革,它要求改革罗马教会推出的赦罪符拯救教徒的方式,建立合理的教会,要求人们直面上帝。民族性是指宗教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人文主义者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德国百姓的外来精神统治、追求信仰自由的要求。宗教改革的产生同德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有着内在的关系^④,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基于宗教信仰平等的德国式基督教,在这种新的理念下,罗马天主教分裂为天主教和新教,信仰分裂又加剧了德意志的政治分裂,“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疆界内的邦国转向新教或天主教,新教邦国建立邦国教会,由此脱离了教皇和主教。在16、17世纪建立了由世俗权力控制的官厅教会,其权力集中在邦国君主手中,邦国权力越来越强大。从历史角度看,宗教改革和30年宗教战争削弱了帝国的权力,强化了德意志各邦国的主权地位。总之,帝国内的宗教分裂导致了帝国内的政治分裂,使得德意志民族国家迟迟不能建立。

(二)马丁·路德的“两个世界论”及其职业观对德意志民族特征的影响

马丁·路德在其《论基督徒的自由》一文中提出了“两个世界论”,将人的世界分为“信仰世界”和“世俗世界”^⑤。在“信仰世界”里,每个基督徒是完全自由的,

^① 参见刘新利:《基督教与德意志民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② Gordon A. Craig, *Über die Deutschen*,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5, S. 96.

^③ Stefan Zeidenitz/Ben Karkow, *Die Deutschen pauschal*,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7, S. 32.

^④ 杜美:《德国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⑤ 参见李伯杰等:《德国文化史》,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87页。

通过《圣经》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这里的“信仰世界”是指人的内心世界,在“信仰世界”里人们拥有精神自由和信仰自由。在“世俗世界”,路德要求教徒服从世俗权威,对世俗权威,人是不自由的;作为上帝的信徒,每个人都有义务维持世俗秩序。路德将帝国看作上帝为人类建构的秩序,要求个人像服从上帝一样服从世俗世界,这被看作基督徒的一种使命。在这一认知理念下,服从世俗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宗教性,这也奠定了德意志百姓对国家制度的认同和服从以及臣仆思想和臣仆意识。在这一国家秩序宗教观的塑造下,在“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内诸侯分治得以长期存在。另外,正是基于这一认知,马丁·路德的“两个世界”思想影响和奠定了德意志民族的内在自由和外在顺从的国民性格。在德意志民族特征形成过程中,作为内在自由的结果,在德国出现了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外在对世俗权威的服从则演变为对上司和官僚的服从,这种具有宗教性的顺从在普鲁士王国得到了极致的发展。

除“两个世界论”外,路德对工作和职业观的新界定改变了之前基督教对工作、劳动的态度。早期基督教将劳动看作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其直接原因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反上帝禁令,偷吃智慧果而被逐出伊甸园,并在人间忍受辛苦劳作的惩罚。路德则认为,任何职业都是为上帝服务,任何工作与教士工作一样高贵,工作不是上帝对人的惩罚,而是为上帝服务,是教徒进入天国的重要途径。这就使工作和使命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职业不再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德语“Beruf”(职业)一词具有宗教和经济双重意义,此词源于“Berufung”一词,意为“得到上帝的召唤和使命”,是上帝赋予一个人的角色,从事某种职业就是接受上帝的安排^①。在这一职业观下,个人按照上帝的安排,做好工作,履行其职责,通过积极努力工作进入天国。劳动和工作具有准宗教性,由此奠定的路德工作观被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原动力,并影响了德意志民族的劳动观和职业观。^②这一职业观不断深入德意志人的灵魂,是德意志人所特有的、积极工作的原因,成为德意志民族国民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地理特殊性对德意志国民特征的影响

德国的特殊地理位置也影响着德意志民族及其国

民特征。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四面有多个邻国环绕,这一地理环境影响着德意志民族对地理环境和周边国家的感知方式,一方面迫使德国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周边国家和周边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同它们进行交往,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和向往外部世界的特有民族心态;另一方面,德国人口多、国土少,人口和国土比例失衡这一特殊性成为德意志狭隘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在这一民族意识驱动下,在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德国多次向周边国家发动战争,向邻国争夺所谓的生存空间。“历史是置于特定地理中的运动”^③,在一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发展中,无论是封建王朝时代还是工业文明时代,德国问题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几乎最终都演变成为欧洲问题。特定的地理空间决定了特定的历史角色。“由于德国的地理位置的缘故,它的命运在任何情况下对欧洲的发展都有十分巨大的意义,从而也必然关系到西方国家的自己命运”。^④

另外,德国特有的地理特性和错综复杂的地貌在进入现代化之前影响着德意志百姓的彼此交往。德国北部靠海,以平原为主,北部往南到处是起伏多变的山脉和高原,在缺少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之前,这些山脉和高原阻碍德意志帝国内百姓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往来,人们长期生活在与外界没有交往的地区,只是同一地区和同一邦国的几代人彼此认识,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了家乡情节和对邦国的政治和文化认同。这种地理特性和特殊地貌所致的生活方式在德国实现现代化后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德国百姓长期形成的邦国认同意识和家乡情节至今依然存在于人们的民族意识中,并构成当今德国联邦制的重要民族意识认同基础;德意志百姓的家乡情节依然以新的方式加以维护,如同乡会和各地每年举行的反映地方传统文化和地方风土人情的民间节日,如慕尼黑十月啤酒节、科隆狂欢节和纽伦堡圣诞节市场等。

^① Vgl. Max Weber,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in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Verlag, 1988, S. 17–236, hier S. 63.

^② 同上, S. 17–236.

^③ 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的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④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1945–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8页。

四、当代德国国民特征及其历史文化相关性

虽说作为一个拥有8000多万人口的德意志民族,其性格不可能一致,但德国由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宗教、地理环境塑造的国民特征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如前文所述,顺从、忠诚、勇敢、荣誉被视为最高的日耳曼美德,在很多方面普鲁士王国继承了日耳曼民族的特点和日耳曼精神,如荣誉、服从和勇敢成为普鲁士认可的道德和行为标准,而且日耳曼民族的尚武性对普鲁士影响较大。在德意志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日耳曼人的勇敢、好战和不怕死的性格也由德国人继承,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战争年代,勇敢成为获得荣誉的阶梯,而在和平年代,人们通过事业的成就去追求荣誉;日耳曼民族的忠诚或效忠和种族纯洁性这一狭隘的民族观曾被纳粹帝国所利用,给人类和德意志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就当代德国国民特征而言,说到德国人,人们常常将他们同勇敢性和秩序性、纪律性和严谨性、忠诚性和法制性、个体性和务实性这些受到德国历史文化诸因素影响的国民特征联系在一起:

勇敢性和秩序性:虽说在和平主义理念下,日耳曼人和普鲁士人的勇敢性、尚武性已不再为国民所接受,但德意志民族的勇敢特征和对荣誉的追求,在德国“足球文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严谨、坚毅、朴实的普鲁士精神和日耳曼人的勇敢和粗犷的个性在德国人足球风格和传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足球精神体现并传承了德国人崇尚勇敢、追求荣誉这一民族特征:在“足球战场”上,球员勇敢拼杀,轻伤重伤都不离场坚持到比赛结束。例如,1970年半决赛德国对意大利的比赛中,贝肯鲍尔在场上被对方踢断了胳膊,作为场上队长和精神领袖他没有退场;1974年德国决战荷兰时,格里克·穆勒全身负伤7处不愿下场,他以令人吃惊的毅力踢进第二个球,为德国捧得金杯;1990年德国决战阿根廷时,马特乌斯手骨在赛前骨折,但作为队长他依然在足球场上勇猛地拼搏了90分钟;1996年欧洲杯决战时,德国队克林斯曼身负重伤上场,伤兵满营的德国队最终获得了胜利。人们不禁会问,为了一场球为何要拼命,输了再踢是常理。从可直观的足球精神看隐性的德意志精神,我们会理解什么是德国式的日耳曼精神。追求荣誉、绝对服从和独一无二的勇敢就是日耳曼精神的核心!在此理念下,我们不难理解,为追求尊严和荣誉,断腿断手能算什么。

今天,我们可以感知的秩序性可见于德国足球在场上运作就像机器一样,既严谨又有秩序。这一国民性内在的隐性特征外化为包括语言在内的外在表达方式:在德国,人们时常听到“秩序”(Ordnung)一词,平时人们相互问候不忘“秩序”一词,“你还好吗?”,“你没事吗?”都与“秩序”一词有关,构成“一切有序吗?”(alles in Ordnung),这些表达方式虽然让人感到缺乏情感,但也反映了人们对秩序的重视。德语“秩序”(Ordnung)一词引申为“规定”、“条例”和“法规”(Verordnung),用于整理文件的文件夹被称为“Ordner”。秩序性/有序性构成德国国民的另一重要特征。在这一理念下,人们反对随意性和偶然性。有序生活虽然有时会使生活死板,但给人踏实而可靠的感觉,避免生活和工作的无序化。

纪律性和严谨性:荣誉来自纪律。原属于日耳曼人和普鲁士军人职业道德规范的纪律性和严谨性,渗透入行政管理机构和普鲁士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通过普鲁士的义务教育制度,将工作伦理和严肃性内化为自觉行为,使人们相信等级制度和权威,培养成自觉服从和自律的精神。这些是“似乎涉及德国人永恒的自然性,事实上,这些特性(特征)是长期教育的结果;威权国家,尤其是普鲁士将这些特性让其臣民接受。”^①由此奠定的纪律性和严谨性在当今德国企业管理上,造就了德国企业的质量品牌,如德国的克虏伯重型机器、蔡斯镜头、西门子电器或奔驰汽车。纪律性、严谨性也体现在德国人对待工作和时间的态度上,他们将准时性看作“最高准则”^②,他们“分秒不差准时下班,下班后还在工作被看作是无工作能力的表现。”^③这种纪律性和严谨性所体现的严肃态度一方面使德国人做事稳重、踏实和认真,另一方面使德国人缺少幽默感,死板、固执,没有灵活性。

忠诚性和法制性:日耳曼人和普鲁士人的忠诚、服从这一国民特征体现在当今德国人的工作态度和职业水准上。在今天,忠诚成为德国许多企业用人的重要标准之一,人们要求员工忠于本职工作、忠于自己的企业,反对跳槽,改行被看作不負責任和轻率的行为。忠

^①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 *Die Deutschen in ihrem Jahrhundert 1890 - 1990*, Reinbeck bei Hamburg: Rowohlt Verlag, 1990, S. 26.

^② Stefan Zeidenitz/Ben Karkow, *Die Deutschen pauschal*, S. 90.

^③ 同上。

诚和服从这一传统的国民特征还体现在做事循规蹈矩,遵守法律,服从权威等级,因为循规蹈矩可以使人避免生活和工作的无序化。在企业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一切按规章办事,遵纪守法作为衡量职工好坏的标准。这也是形成德国人拘泥、呆板性格的原因之一。另外,在德国人眼里,忠诚性或诚实性是建立人际信赖关系的基础,信赖和信任是社会交往和商务活动的基础。坦诚、直率、直言不讳的交际方式被看作诚实的表现。

马丁·路德对“世俗世界”和“信仰世界”的界定体现了宗教因素在社会中产生的特殊意义。“法制高于人治”源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核心。马丁·路德认为,世俗权力中神圣的东西不是人本身,而是法制,上帝会对破坏法制的人实行审判。这也是他宗教改革的重点,反对个人和上帝之间通过中介(牧师)实现沟通。马丁·路德把世俗秩序神圣化,是因为他认识到,政治制度的稳定是社会繁荣安定的大前提。马丁·路德强调社会秩序的稳定,他认为信仰和政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世俗领域需要的是世俗权力。当信仰的自由和对世俗权力的服从不能达成和谐时,行动上应该服从世俗权力所带来的服从命令。这是因为,置身于“世俗世界”的个人要服从上帝为人类建立的秩序,法律又是维护现有秩序的,理应执行。虽然说德意志民族那种顺从的臣仆意识已被摆脱,但长期历史沿袭下的一些心理仍存在于德国人的性格与意识中。它更多地体现在法制意识上,并支配当今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日常生活:如对德国公务员来说,法律和规章是为民办事的出发点,他们本人只对法律负责。在某种意义上说缺乏同情心。法律也调节和决定了德国公民的社会生活、人际关系和职业生活。社会法律化和个人利益法律化又致使大量民事纠纷的产生。

个体性和务实性: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反映了日耳曼民族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和生活状态,自由精神或自由意识成为德意志民族性的一部分。由于马丁·路德神学是基于一种内在的、个体的认识和体验,因此,它也建构了路德神学的“个体性”内核。从这个意义上

而言,马丁·路德可以称为近代个人主义的先驱,他更为强调作为内在个体的人。但路德的个人主义,不同于文艺复兴的个人主义,寻求个人才能的满足;他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对个体存在的主体性认同和关切,他认为,每一个灵魂,在上帝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是无可被别人替代的,因此,必须自己面对生与死。这些个体性特征在今天看来,体现在德国人强调自我,喜欢自己的天地不受别人干扰,喜欢自己决定生活。与德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相应,显示棱角被看作有能力的表现,反对模仿他人,在工作上要有自己的特点和观点,凸显自己的创新和创意。强调自我也是实现自我和追求个人利益的出发点,这被看作是合法的、正常的、可以接受的。

德国人的务实性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对生活的严谨性所致。务实性反映了德国人对工作和生活的务实态度。人们反对工作马虎和做事只求过得去的心态,做事认真,讲究精确,重视质量,追求效率,办事要求承诺。恪守信用被看作重要的社会义务,它贯穿于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另外,就事论事在很多方面构成了德国人对人和对事的务实态度,也表现为德国人对事的精益求精和完美的追求,这种对完美的追求也是德国工业产品质量至上的保证,并使德国产品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对德国人来说,“好没有好够”,追求完美使人们获得最大的快乐和满足。务实、节俭和效率成为战后德国快速发展和“取得经济成就的重要驱动力”^①。先工作后娱乐是德国人务实性的特点之一,在生命、工作、娱乐这三者关系上,人们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结束语

一国的国民特征都有特定时空和文化载体所致的“民族特性”。鉴于这一认知出发点,探析哪些因素对一国当代国民特征和文化核心标准产生影响并被传承,界定民族性所反映的特有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国际交往中更好地把握目的国的国民特征,有效促进跨文化沟通。这也构成了本论文写作的学术目的所在。

责任编辑:郑春荣

^①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 *Die Deutschen in ihrem Jahrhundert 1890-1990*, S. 27.

Schutz der Policy-Autonomie: Erfahrung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or finanziellem Druck der USA und ihre Aufschlüsse

Yan Rong

In den 1960er Jahren kam es zu Spannungen zwischen dem internationalen Finanzsystem und militärischen Verteidigungssystem NATO. Unter anderem forderten die USA von der Bundesrepublik, ihre Defizite in der Leistungsbilanz zu kompensieren. Angesichts des starken finanziellen Drucks aus den USA setzte die Bundesrepublik viele Taktiken durch, um ihre Policy-Autonomie zu schützen, darunter vor allem die Verschleppung der Anpassung, Erhöhung der Transaktionskosten für die Anpassung und Verringerung der Finanzkosten für die Anpassung. Durch eine tiefgehende Analyse dieser Erfahrungen kann man nicht nur das internationale Finanzsystem besser verstehen, sondern auch überlegen, wie China auf den Druck aus den USA reagieren soll.

Studie zu deutschen Charakteristika aus kulturgeschichtlicher und geographischer Sicht

Wang Zhiqiang

Die nationalen Charakteristika eines Staates sind geprägt von der besonderen Historizität, dem kulturellen Kontext und den geographischen Gegebenheiten. Des weiteren haben sie aus kultureller Sicht die sichtbare wie die unsichtbare Dimension in sich. In dieser wechselseitigen Besonderheit spiegeln die sichtbaren nationalen Wesenszüge die unsichtbaren Kulturwerte und die kulturgeschichtlichen Besonderheiten eines Staates wider. Davon ausgehend wendet sich die vorliegende Abhandlung den deutschen nationalen Charakteristika zu und versucht, aus deutschkulturgeschichtlicher und geographischer Sicht die Faktoren zur Ausformung der deutschen nationalen Charakteristika zu ermitteln, um von diesem Erkenntnisstand her die gegenwärtigen deutschen Charakteristika darzustellen.

Über das triadische Entwicklungsmodell der Menschheitsgeschichte bei Hölderlin

Zhao Leilian

Hölderlin stellt - ähnlich wie einige deutsche Dichter im 18. Jahrhundert - durch das triadische Entwicklungsmodell der Menschheitsgeschichte von der Vergangenheit über die Gegenwart zur Zukunft seine eigenen Auffassungen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und Poesie dar. Die Allharmonie bildet ein eigenartiges Merkmal in seinem triadischen Geschichtsmodell. Die Entwicklung der Menschheitsgeschichte soll seiner Ansicht nach wie folgt verlaufen: Die Harmonie und Blüte der Vergangenheit verwandelt sich in den Verfall und die Disharmonie der Gegenwart der Moderne und darin bergen die Wiederblüte und höhere Harmonie der Zukunft in sich. Der vorliegende Beitrag versucht, aufgrund der Analyse der Werke von Hölderlin sein triadischen Geschichtsmodell aufzuzeigen.

Die Moderne in Martin Walsers Erzählungen am Beispiel der Erzählung *Der Umzug*

Xu Linfeng/Huang Keqin

Die durch Modernität geprägten Werke des deutschen Schriftstellers Martin Walser haben vor allem einsame und entfremdete Figuren gestaltet, welche durch die moderne Gesellschaft charakterisiert sind. Mit tiefgründigen Gedanken und höchster Kunstfertigkeit verkörpern die Werke Walsers vortreffliche Verbindung des Inhalts und der Form. In der vorliegenden Arbeit wird am Beispiel der Erzählung *Der Umzug* versucht, die Moderne in Walsers Erzählungen zu analysieren.